新中国成立初

我国实施过多少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新中国成立初 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上世纪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上世纪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世纪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据人民网)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3页纸,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近500字。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泛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份看似平常的手稿,由邓小平同志亲笔拟就。

标记时代转折的一份珍贵手稿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彼时的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方兴未艾,中国往何处去的追问,在无数人心中涌动。邓小平关注着会议进程,思考着他将要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的内容。

他在手写提纲中列了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写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指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坚定有力的话语振聋发聩: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和回答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党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明确了党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三页讲话提纲,标注着一个伟大转折的开始。

(据新华社)

拾遗

毛泽东:对黄河的特殊情感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其名作《沁园春·雪》中的"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在延安时,斯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黄河流域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的时间,出京对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现场视察。

10月27日,毛泽东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济南历史上决口频繁、灾害严重的泺口险要处。毛泽东站在抗洪大坝上,远眺滚滚的黄河水,深思后问:这里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高多少?有人回答:6至7米。毛泽东深情地交代,要把大堤、大坝修牢,万万不要出事。毛泽东顺堤前进,边走边谈,怎样修好堤、修好坝,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许世友说: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前进中,看到堤外大片盐碱地,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人回答道:黄河高(悬河),堤外低凹,再加小清河多年未疏通,排水不畅,造成耕地盐碱化,种不保收。群众说:"春天一片霜,秋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这一片上下有15万亩地种不成庄稼,群众生活困难。

毛泽东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引用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不行吗?省领导说:没经验,我们一定试试办。

在河南,毛泽东看到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他对大家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天津日报》)

父母在不远游 在唐朝写进法律

敬老自古就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少朝代推出敬老措施

中国人将敬老视为人的一项根本美德,历代都将敬老视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行了一些敬老的措施,期望使老者在物质上充足、在精神上安乐。

《二十四孝图》之涤亲溺器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和书法家,哲宗元符年间位居太史。他虽然身居显位,但每晚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马桶)。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现了一件木鸠杖,现藏甘肃博物馆。这件木鸠杖高196.5厘米,杖杆细长,杖顶是一只彩绘的鸠。我们在其他博物馆中,也能见到汉代的鸠杖首,有的鸠口中还含着食粒。鸠杖又被称为王杖,朝廷一度只赐给年龄在八十以上的老者,但那时人的寿命比今天短多了,所以后来调整到年龄七十以上的老者就可获赐鸠杖,这样更能表达朝廷尊老之意。

汉代的鸠杖不是一般的手杖,而是朝廷颁发给年高德劭者的一种荣誉。获赐鸠杖意味着同时获得了一系列的礼遇和优待,如可以自由出入官府,见到地方长官无需疾步而行;如可以行走在驰道的中间(这个位置若无朝廷特批,普通人是不能行走的)。获赐鸠杖的老者甚至享有相当程度的司法免责权,而辱骂、殴打获赐鸠杖的老者则要以大逆不道论罪。

为何以鸠作为手杖的装饰,而不用其他动物呢?东汉应劭编写的一部社会风俗史著作《风俗通义》中有一个相当传奇的故事:刘邦与项羽在荥阳一带大战,项羽攻势凶猛,刘邦节节败退,躲到了草丛中,前来追赶的人逼近刘邦时,忽然听到鸠鸣声声,追赶的人认为有人在一定会把鸟惊走,这说明前面肯定没有人,于是掉头走了,刘邦因此逃过一劫。刘邦取得楚汉之争的胜利后,认为鸠乃非同寻常的鸟,遂命人制作鸠杖,赐给老者。此外,鸠在古人心目中又被认为是吃东西不会噎着的动物,赐予老者鸠杖,也包含着希望老者进食顺畅的祝愿。

汉朝

七旬以上老者赐鸠杖 可享系列礼遇和优待

唐朝

保护老人不受虐待 法律规定侮骂父母者处绞刑

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钦定重阳为"敬老节",《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载:"九月丙午,诏曰:'尚齿重旧,先王以之垂范。'"所谓"尚齿",就是尊老敬老的意思,还制定了物质助老的基本标准,普通老百姓中的老年人(60岁为基准)赋役全免,50岁的士兵便可还乡种田,55岁免课役。

除保障老人基本生存权,唐朝还制定了老人不受虐待的条文,违反者,从严惩处。《斗讼律》规定,子孙侮骂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殴打者,处斩刑;过失杀者,流放三千里;过失伤者,徒刑三年。子孙的妻妾侮骂祖父母、父母者,徒刑三年;殴打者,绞刑;伤者,斩刑;过失杀者,徒刑三年;过失伤者,徒刑两年半。并将侮骂和殴打尊长的行为,列入不赦的"十恶"之内。今天看来,这些条文属于"严刑峻法",但客观上保障了老人不受虐待。

唐初宰相长孙无忌编著的《唐律疏议》,既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一部律法典,也是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它以立法的形式提出养老制度与老年人权益,为老年人物资和精神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孔子虽很早提出"父母在不远游",但直到唐朝才将此作为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同时还附加了"父母健在,且不能与父母分割财产和房屋"等条款。《唐律疏议》卷一谓:"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通俗地说,就是赡养老人要在不违背老人意志前提下满足其各方面需求。

明朝

基层社会常见纠纷 诉讼前须先经过老者调解

明朝初期,鉴于元朝大变传统礼俗,朝廷开启了一场遍及城乡的礼俗改革,意图匡正旧弊、淳化人心。1398年,朱元璋正式颁发《教民榜文》,这是明初礼俗改革的一份重要文献,而老者在此改革中的作用十分关键。

《教民榜文》规定在基层组织"里"(以110户为一里)中以推举的方式选出一批年龄在五十以上、品行正直且受人尊敬的老者,数量或三位或五位或十位,由官府将老者姓名登记在册,这些老者被赋予处理部分民间诉讼的重任。《教民榜文》明确禁止百姓越级诉讼,一些如口角斗殴、争夺田产等基层社会出现频率较高的纠纷,必须先经过老者的调解,如果处理未果,才得赴官诉讼,未经老者调解直接赴官,原告要被惩罚,而且仍要回到老者调解的环节上。

清朝

康熙与乾隆二帝 四次举办千叟宴

清朝在敬老方面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其中举办千叟宴成为历史上的佳话。

清朝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康熙在1712年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人均寿命也有所延长。在康熙和乾隆这两位长寿皇帝在位时,共举办了四次千叟宴,康熙和乾隆各两次。

1785年是乾隆皇帝即位五十周年,这年正月初六,乾隆邀请三千多位六十岁以上的老者到紫禁城内的乾清宫参加宴会。紫禁城分前朝和后寝,前朝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地方,后寝是皇帝的家,乾清宫已在后寝的范围内,皇帝将老者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吃一顿饭,这在古代是一项莫大的荣幸。宴会上,除了以珍馐美食供奉老者,也有赋诗的文化活动。皇帝还向老者赠送了如寿杖、如意等礼物,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还为此次千叟宴特别制作了"御赐养老"的银牌颁发给老者。(据《厦门晚报》)